

北大版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出版案例调研

作者：郭峰 来源： 时间：2006-3-4 被阅读次数：12

近十几年来，许多出版社用简体字出版了我国传统的文化古籍，以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要，可以说，古籍的校点工作直接影响着古籍本身的传播和普及。古籍新的编排方式的出现，不仅把爱好古文的读者从众多的古文译注中解脱出来，也为一部分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快捷和方便的阅读条件。诸如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陈延嘉、王同策、左振坤等校点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采用新式标点简体字横排面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是古籍校点工作中的新收获。上海汉大出版社出版了新版《康熙字典》。以道光王引之订正本《康熙字典》为底本，重新横排出版，加标点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使读者得到一部与现代字典形式相近而又原汁原味的《康熙字典》。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中国中医学大成》和《中国中医药光盘图书馆——针灸全书》，新书精校细勘、改竖排为横排、繁体字为简体字。再如黄山书社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宋词元曲全集》为元朝以来收录最全的简体、横排、标点本。尽管在古籍出版中，这些只是为数极少的一部分。但是，它无疑说明了一个趋势，对传统古籍尤其是在校勘方面已经十分成熟的古籍应该适当地采取简体横排的形式，以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下面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十三经注疏》作为案例进行详细分析。

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的报道：2000年4月8日下午，《十三经注疏》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幽静的临湖轩召开。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邬书林、教育部社政司副司长阚延河和我校党委书记王德炳等有关领导以及国内知名学者共3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王德炳书记、何芳川副校长和杨牧之、阚延河、邬书林分别作了讲话，对《十三经注疏》的出版表示祝贺。张岱年、任继愈、李学勤、张岂之、汤一介、田余庆等十几位学者也作了即席发言。座谈会由北大出版社副总编张文定主持。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等十三部最著名的儒家经典。十三经以及历代为解释其内容而作的注疏在我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此次出版的《十三经注疏》是简体横排本，并加了标点，目的是让普通读者也能通畅地阅读，方便地使用，并直接感受这套典籍的渊深博大。此次出版的《十三经注疏》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专文批准，具体校点工作由十多位学有专长的学者担任，同时由8位国内知名学者审订把关，无论整理水平还是出版质量都可以称得上精良。据悉，年内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此书的繁体大字本，目的是给研究机构和学者们提供一个方便利用的善本，同时，也是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华人、华侨以及学者提供一个方便的可读本。

十三经言简意赅，历代经学家对它作出不少有价值的注疏，注疏和经文受到同等重视，不可偏废，在校勘和训诂方面，历代学者对其都进行了不懈地努力。因此，清代集中优秀人才，历时多年，完成一部《十三经注疏》，这部名著二百多年盛行不衰。凡研读经学者，不经历《十三经注疏》难窥门径。可以说，在浩如烟海的古籍资源中，它是一部整理得比较好的经书，虽然个别地方争议仍多，但瑕不掩瑜，实已千锤百炼。它的简体横排的出版，得到了广大专家的好评，其优点由此可见一斑。

《十三经注疏》问世，迄今已过了二百年，这二百年间，经学研究不断有新进展，有文字训诂的，有义理阐发的，也有考古发现的新资料。到我们这一代学者，视野拓宽了，有了新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我们有条件在充分利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个整理本的问世，无疑将为我国经学研究作出新的贡献。这个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将代替清人编纂的旧本，再流行它一二百年应当不成问题。——任继愈(国家图书馆馆长)

十三经是古代儒家经典之作，涵盖哲学、史学、文学以及语言的文字等多种学科，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典籍。但长期以来对这部经典之作未做新的标点、校勘。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整理本《十三经注疏》，应当说是古籍整理的一个很大进展，很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古籍整理的上乘之作。——傅璇琮(原中华书局总编辑)

整理《十三经注疏》这样的古籍难度很大，但整理者和出版者态度认真严谨，在标点校勘等方面均严格按照古籍整理的规范进行，保证了此书的整理水平以及出版质量。这套书的出版将为读者提供很大的方便，并有助于整个传统文化的研究。——袁行霈(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

古籍整理中标点校勘都相当困难，尤难者是给校勘下判断，《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在这方面用力甚勤，态度谨严，为大型古籍的整理提供了一个范例。——汤一介(北京大学著名教授)

传承文化，学术为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贯宗旨。出版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正是我们为宏扬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一点努力。——彭松建(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本《十三经注疏》，我认为所有通行版本中最好的。——张岱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①)

我国1955年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64年正式公布了汉字简化字总表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又重新发表了《简化汉字总表》，三次简化的方案奠定了简体汉字在中国大陆出版物中的主体地位。此外，汉字排版的传统方式是字符由上而下竖向排列，行列从右到左排列。但是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建议将汉字排版格式改为字符横向从左到右排列成行的形式。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一律改为横排，对中文版式进行了合理的改革，以后在书刊中全面推广。这是由于竖排不利于中西文混排和插排数学与化学公式，书写时也不方便；同时，这也和当时的汉语拼音方案相得益彰，因为显然汉字竖写是不方便注音的。此后，只有古籍整理和教学研究当中才能允许繁体竖排版本出现。而此后几乎所有的古籍出版都是采取这种形式，极少变动。这不仅是因为古籍出版的特殊性，也是由于对于普及传统文化的不够重视及传统出版模式下对于读者受众的忽视。古籍出版只能“原汁原味”吗？中国有五千年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载体，很多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但怎么继承和普及我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何出版古籍，是影印、繁体、句读还是简体横排，涉及到学者、出版人和广大普通读者。社会要发展，时代要进步，有些文字总会被淘汰。在今天，能区分“后”和“後”固然是一种学识，但孔乙己不也会茴字的四种写法吗？我们还有很多曾经美丽的文字，但谁也没法用甲骨文写信、发E-mail。中国几千年璀璨的文化有没有流传下来，不能只从使用文字的繁简上区分。普通读者对简体横排的古籍是极受欢迎的。我们从上小学接受的就是横排简体字。不光不认识繁体字，还看不惯竖排的书。这好像是个阅读习惯的问题。一般读者看廿四史和学者、研究人员当然不一样，我们只求基本看懂，而不去深究训诂什么的。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评论，的确有可供商榷甚至错误之处，但其所代表的又是大多数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意见。要想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了这样一批读者是不可想象的。与这种意见相对应，多数以出版古籍为主的出版社也不反对横排简体本。

《中华读书报》1999年02月24日报道：全国率先出版简体横排古籍的岳麓书社的社长夏剑钦论证了出版简体古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认为，从市场来看，古典著作普及读物是较大的一块，出版社应该满足读者需要。至于可能性，他认为有些古字、异体字的区分对一般读者没有多少意义，书法家能在祝寿时写上许多字形各异的“寿”字，但知道算是长了见识，不知道也没关系。真有必要区分的，可以通过注解说明，同样可以达到效果。夏社长接着提出盲目追求古籍原汁原味的不可取：古和今是相对的，文字不断在变化。再就是政治行为的干预，比如岳麓书社的《王船山全集》如果一定要保持原貌，那只有找到作者原稿，因为刻本因避皇上讳已不是“原貌”；换了一朝皇帝，新刻本又要避讳。这对绝大多数读者，甚至包括一些研究者来说，也并非必需。岳麓书社之所以因《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在读者中广受好评，声誉鹊起，该书也成为出版社的看家书之一，正在于它的简体横排更贴近普通读者，它的“普及”的作用更容易真正实现。

北大出版社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思想，而选择《十三经注疏》则不仅是由于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由于该书的校勘比较成熟，适宜简体字的形式。因为，由于目前的技术，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把繁体古籍不加区别地翻成简体，实际上是一种不完全可逆的失真转换。书本文献方式也是一样：把繁体竖排古籍排印成简体横排出版，目的是便于今人阅读，但繁体古籍原本是个自足的系统，在印成简体后，原系统或多或少地会被打破，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反而影响精确理解。因此，只有在校勘方面比较成熟的古籍才会降低失真的概率。诸如上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校勘，多年以来，人们对严氏《全文》已做过一些研究，但总起来说这些工作是零散的，缺少系统的。其中多处长篇拼接有误，或者不当，误读原书而致误收等等。以至于简体横排的版本无法克服，反而更影响准确度①。

综上所述，正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例子而言，应该根据读者对象不同，既出版资料价值大、供专业人员使用的繁体字本，也不否定供一般读者阅读的简体横排本的存在价值。从经济学上来讲，这叫做价格歧视，可以提高所有成员的福利水平，何乐而不为那呢②。只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古籍，选好方向，把好编校关，简体横排的古籍出版同样有它的生命力。当然，由于不同出版社都有相对固定的出书方向，也有相应的读者群，在出版适用于一般读者的简体横排古籍上，也不必强求一致。有些国家级的权威社，从保持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看，自然不该轻易转变出版方向。我们应有的态度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参考书目】：

- 《出版史研究》 第一辑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81
-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1 01
- 《求是学刊》 2002 02
- 《语文建设》 1994 01
- 《光明日报》 2001.6.21
- 《中华读书报》1999.2.24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3
- 《新民晚报》 2002.6.5
- 《语言文字应用》2000.8
- 《高校图书馆工作》2002.2
- 《中国图书出版史》 肖东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科学旧踪》 樊洪业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9
- 《微观经济十八讲》 平新乔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 《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 《出版改革的探索》马守良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 版权所有2005 · Mail:xiaodongfa@pku.edu.cn 电话: 010—62754683

Copyright © 2005 Modern Publishing Institute All Copyright Reserved